

# 无悔人生 ——共和国海洋地理专家刘恩兰

□ 黄宗慈

刘恩兰历经艰辛回到祖国,在迁到成都的金凌女子大学任教。这时李四光早已在庐山发现“中国冰川”,她主张在地质讲义中加入“中国冰川”的内容,可是一位英国教授不同意,认为国外地质论著中没有引用过这个材料,说明靠不住。因此,不能写在讲义中。刘恩兰反驳说:“‘中国冰川’已由李四光教授考察、研究和证实,你们没有,说明你们糊涂,应该在讲义中向学生介绍。”两人争执到教务长那里,教务长裁定是“暂不写入讲义”。当时吴贻芳校长在国外,刘恩兰一气之下,不辞而别,随一辆拉货的大车到了兰州,在兰州大学讲学一年。一直到吴贻芳校长回来,得知此事,写信请刘恩兰返校,她才回到成都。

1946年,刘恩兰应中美文化协会邀请赴美讲学。他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黑人居住区考察了一个黑人生活,又到落矶山谷干旱地区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考察印第安人生活。不幸,刘恩兰遇了车祸,严重的创伤使她在美国医院里住了两年。这时,医生劝她再住一年,保证她可以痊愈。但倔强的刘恩兰带着伤残回到了即将解放的祖国。

三

1953年,刘恩兰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工作,8月,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在办公室里跟她进行过一次谈话:“您搞地理,懂得海洋,海洋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您了解。我们想请您为中国的海防,为海洋开发、海军建设做些贡献。”刘恩兰爽快地答应了。

有一次军舰出海到旅顺口外考察,当时的苏联专家建议,刘恩兰不要上舰。苏联专家说:“苏联女人是不上军舰出海的。”刘恩兰反问:“苏联女人不上舰,因此,中国女人也不能上舰吗?”刘恩兰向领导反映:“如果不上舰,我坐在岸上干什么?不上舰,我就不去考察。”领导请示北京,北京回答:“上舰。”这次出海收获很大,刘恩兰写了一份资料丰富的报告。

刘恩兰不但随舰出海,她还乘潜水艇出海。潜水艇是在颠簸中前进的,空间狭小,这样艰苦条件一般男性都不能承受。刘恩兰以坚强的意志战胜困难,为祖国海防觅取宝贵的资料。

有一次海面风浪很大,刘恩兰已经60岁,时任海军司令部航保部一级研究员,随舰出海。黄海的狂风恶浪使她胃病复发,猛地吐了一口血,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刘恩兰拒绝了舰长向上级的返航请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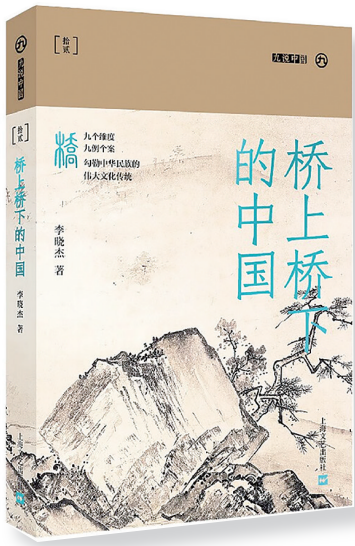
四

1979年,刘恩兰作为中国科学代表团顾问到澳大利亚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学年会,并参加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在南太平洋航海中心,刘恩兰和大家一起登上270米高的电视塔,俯瞰悉尼港,远眺南太平洋。同年,在青岛,中国海洋学会组织全国中学生航海夏令营,她带领学生们攀上几层楼高的软梯,参观万吨级远洋轮。坚强的性格,坚定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使她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强的行动,甚至是人们难于理解的行动。

刘恩兰是单身女性。别人问起她,为什么当时不考虑结婚的问题。刘恩兰回答得很坦率:“说句实在话,我当时有做不完的事,有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我简直没有时间考虑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我追求的是做学问,没有时间追求爱情。但是,请你不要宣传我是提倡单身主义的。我主张这个问题让人们各自去考虑。”

后来,刘恩兰以80岁高龄继续担任海洋局的顾问,海洋、航海、气象、地理等4个学会的理事。这位坚强的女性以她的光和热描绘出海洋世界绚丽的晚霞。1986年7月15日,刘恩兰病逝,享年81岁。

(连载下·全文完)



## · 书赏 ·

### 阅读千年古桥 感受工匠智慧

□ 钟芳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天净沙·秋思》里那充满古风古韵的小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是桥的故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从古至今,绵延不绝。遍布在大江南北的历代桥梁,一座座千姿百态,似飞龙在天,如长虹卧波,像彩凤飞舞,展现了光辉技术与文明篇章的绝佳结合,蕴含着千百年传统文化的精髓。

《桥上桥下的中国》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李晓杰撰写的以“桥”为主题的著作。作品以我国古代桥梁的起源、发展及其特

点为主线,对桥梁基础的类型及建造技艺进行全面而形象的介绍。就每一座古桥而言,在结合介绍桥梁特色和技术成果过程中,涉及到其形制、结构、功能、审美、历史、文化典故、民族特色等方面,浓彩淡墨式勾画出每一座桥梁的绰约风姿,呈现出了丰富的桥梁样态,令人犹如欣赏一册中国古代桥梁珍藏集。

全书共分为“天堑条条变通途——古今史话”“梁拱锁浮齐斗艳——营造之木”“力与美中奏和弦——构建之妙”“别具一格美如画——园林飞虹”“文人墨客折腰——诗中赏桥”“苍龙负空连胜负——桥上战事”“人杰桥灵忆往事——佳话典故”“鹊桥仙中桥仙缘——神话传说”“年年岁岁心系桥——桥俗民风”9个篇章,内附大量桥梁的手绘图,生动地将古典桥梁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具有很高的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书中,李晓杰不仅以细腻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中国古桥,还挖掘出桥梁的发展轨迹,以及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使全书内容丰富饱满,可读性强。

《说文解字》云:“桥,水梁也,从木,乔声。”早在远古时期,人们跨越河流和峡谷利用自然倒下来的树木以及沿岸生长的藤萝作为跨越的媒介,后来人们从中受到启发,才逐渐开始有意识地伐木搭桥。西周至春秋时期是我国桥梁的起始时期,当时已建有梁桥和浮桥。《诗经》有言:“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大意为:狐狸独自慢慢走,走在淇水桥上头。可见当时已有梁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桥梁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修筑了不少的桥梁。比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位于今天陕西西安灞水之上的灞桥。据《三辅黄图》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自建成至今的两千年间,灞桥一直是长安与潼关以东的交通咽喉,又是古人折柳送别的所在。因此,在后人传颂的不少著名诗文中都有灞桥的影子。

隋唐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桥梁的全盛时

期。当时的能工巧匠不断推广运用前人造桥的经验和智慧,创造了许多伟大奇迹。首先要说的就是隋代工匠李春创建的赵州桥,距今已1400多年,是世界现存最古老、跨度最大的敞肩圆弧石拱桥。其“敞肩拱”的设计,是世界桥梁史上的首创,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桥面栏板望柱浮雕蛟龙奇兽或盘或踞、或飞或腾,跌宕多姿,引人入胜,显示了苍劲古朴、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赵州桥是我国造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全世界后代桥梁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

同样瞩目的还有建于南宋乾道年间的广东潮州的广济桥、北宋名臣蔡襄主持修建的泉州洛阳桥等,这些桥梁的不断涌现不仅体现出古代造桥技术的成熟,也体现了劳动人民不断探索和创新的民族精神。

元明清三代,是桥梁集大成而完善的时期,当时更加注重对古桥的修缮,以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众所周知的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丰台区永定河上,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拱桥。其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明正统九年(1444年)重修,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该桥最令人震撼的是,桥上荟萃了金代、元代、明代、清代和近现代的石狮作品,据统计共有501只之多。个个雕刻精美,神态活现,融汇了各个时代的艺术特征,组成了一座天然的石狮博物馆。除此之外,卢沟桥又以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地而载入史册。

桥梁专家茅以升曾说过:“桥是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创造,是一国文化的特征。”中国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用途,孕育出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大小桥梁,造就了享誉世界的桥梁文化。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奇伟桥梁更是拔地而起,耸入云端,充分彰显着人民的智慧和国力的强大。作者认为,将古桥梁的艺术和文化特色弘扬和传承下去,对现代桥梁技术的发展大有裨益。

## · 甘肃人物 ·

# 沉勇大略的陇上名将 —— 赵充国

□ 柴冬茂

古稀之年 请缨出征

羌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部族,以游牧为生。战国早期,居住在今四川北部、甘肃西南、青海大部的羌人逐渐发展起来,成了当时西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他们主要活动在西部地区,史称“西羌”。秦统一六国后,驱逐羌人至边远地区。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羌人势力日益强大,开始向东扩张,不时侵扰汉朝边境。特别是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后,迫使羌人离开了水草肥美的湟水流域。对此,羌人多向朝廷提出,将湟水流域划归他们放牧。

元康三年(前63年),汉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西羌地区。先零羌首领杨玉又一次提出东渡湟水游牧的要求。义渠安国把先零羌的请求报告朝廷汉宣帝,宣帝答应了先零羌的要求。赵充国得知这一消息,对羌人渡水放牧的真正目的产生怀疑,担心他们渡水会对西汉构成严重威胁,于是马上向汉宣帝上书,表明自己的忧虑。汉宣帝看了赵充国的奏

章,召回了义渠安国,拒绝了先零羌的要求。但是,杨玉不肯罢休,率部强渡湟水。随后,他们又联络二百多位羌族部落酋长,订立攻守同盟条约,并派使者向匈奴借兵,企图进攻都善、敦煌,切断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

汉宣帝收到消息,急忙召见赵充国,请他分析羌人的战略意图。赵充国向汉宣帝说:“西羌各部部落相互联合,如果再与匈奴勾结,等到秋后马肥,必然起会攻击汉境,遂向汉宣帝建议立即派人前往边关,一边训练士卒,做好战斗准备;一边派人深入西羌,对羌人各部落头领晓以利害,以免被利用,继而瓦解羌人的部落联盟。汉宣帝采纳了赵充国的建议,又派义渠安国出使西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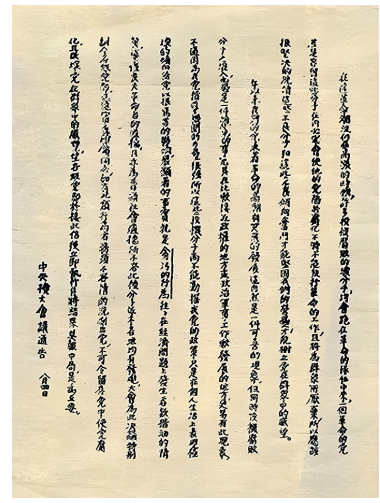
义渠原是匈奴的一支,后依附了汉朝。义渠安国的性格刚烈,因上次出使西羌没有完成使命,使得他颜面尽失,所以这次出使西羌,更是杀气腾腾。到西羌后,义渠安国决定杀一儆百,遂召集三十多位羌人部落首领,一顿怒斥后,推出

营门全部斩杀,还纵兵乱杀先零羌一千多人。他的这个错误行动,彻底激化了羌人与汉朝的矛盾。先零羌首领杨玉联络各部族,一边围攻义渠安国的军营,一边攻打汉朝边城,掠杀官民。义渠安国不是羌人对手,丢了粮草辎重,率领三千骑兵连夜逃往浩亶(即今永登县西南大通河东岸),很快又遭羌人追杀。义渠安国一败再败,率残兵败将逃至令居(今永登县西北部)。他无力反击,只好急忙上奏朝廷,请求出兵。

由于义渠安国的鲁莽行动,致使西羌举兵反汉,汉军大败。于是,汉宣帝决定派人征讨西羌。可是,谁派领兵出征,这难住了汉宣帝。在众多的文臣武将中,唯有赵充国“通知四夷事”,可他已年届七十,派他领兵打仗,众官员无不摇头。无奈之下,汉宣帝派御史大夫丙吉拜访赵充国,请他推荐一人领兵出征。让汉宣帝没有想到的是,赵充国毛遂自荐说:“亡逾于老臣者矣!”就这样,年届古稀的赵充国请缨出征,担起了平定西羌的重任。(连载二)

# 我党颁布的 第一份反腐文件

□ 钱国宏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随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队伍不断扩大。1923年全国党员人数为400余人,到1925年迅速发展为3万余人。在1925年11月至1926年7月的9个月中,党员数量猛增了三倍。北伐战争开始后,党员数量进一步增长,一些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忽视了对要求入党人员的考察和教育,有的地方甚至搞突击发展,在一些掀起革命高潮的中心地区,甚至出现全家或全村入党的现象。如湖北举行征集党员,一次“加入者达二千人”,其中,“大概一半以上须淘汰出去”,造成了“党员数量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的情况,使一些思想不纯、作风不正、品行不端的人员混进党组织,甚至包括一些投机分子。泥沙俱下,难免良莠不分,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现象随之产生,少数人贪污腐败的现象随之出现。在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中,就发生了多起不良分子以权谋私的腐败事件。这表明,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腐败问题已开始侵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的肌体。

二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要求从严惩党内滋生的腐败现象。会后,中共中央于8月4日颁布《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文件。文件全文如下——

###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时候是容忍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败,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一年以来,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尤其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更易有此现象。不过因为我党指导机关的力量很强,所以这些投机分子尚不能动摇我党的政策,只是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会道德所不容。此种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望各级党部于接此信后,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局,是为至要。

八月四日

文件中的陈述,言简意赅,既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又有战略家的明察秋毫,把腐败的危害和中国共产党对此的态度讲得清清楚楚。从文件中所使用的“坚决”“迅速”“务须”“不容情”“立即执行”“是为至要”等措辞,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鲜明而坚定的态度。

三

1928年,我党依据《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之规定,将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复元开除出党。

王复元,山东历城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任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很快成为党组织在青岛的负责人。王复元掌权后私欲膨胀,多次贪污公款。1927年4月27日,党组织派时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复元出席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中央让王复元带回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千元,而王复元竟将这笔经费据为己有,并谎称经费在途中被窃。之后,王复元利用职务之便,还曾多次贪污公款。1928年4月,王复元又去上海与党组织联系为由,从直属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印刷部的集成石印局拿走两千元资金,贪污腐败,导致承担印刷山东党内刊物《红星》、党的文件与宣传材料重任的石印局被迫停业。

王复元贪污党费的丑事被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及时发现。邓恩铭依据《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的规定,将王复元开除出党。邓恩铭由此成为中共历史上反贪第一人。王复元成为中共党史上因贪污腐败而被开除出党的第一人,王复元被开除党籍后,对共产党怀恨在心,竟于1928年投靠国民党,并于1929年1月19日带领特务秘密抓捕了邓恩铭等17人,致使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派中央特科成员赴山东锄奸。1929年8月16日,王复元在青岛被中央特科处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四

1932年5月9日下午,清脆的枪声在瑞金城西东坑村山岗回响,震动了整个苏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反腐败的第一声枪响。被执行枪决的,是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

谢步升是瑞金县九区叶坪乡人,家境贫穷,12岁起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长。1930年,谢步升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2月,谢步升因企图强奸同村妇女,被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当日下午,谢步升被处以枪决。此案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案,为我党有力打击贪污腐败犯罪、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败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篇严惩腐败的战斗檄文。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反腐败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革命宗旨的真实写照。它表明,在我们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在危难之际柳暗花明、磨难面前绝境重生,与我们党在推进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